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ECONOMICS AWARD

获得者著作

马洪文集

第六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像

作者简历

马洪，1920年5月18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待阳村。原名牛仁权，1938年春在延安时改名马洪。曾用名牛黄、牛中黄。

他出身贫寒，13岁时被当地小学聘为教员，开始自食其力。他自学中学课程，并协助当地著名爱国人士、族人牛诚修先生修订《定襄县志》。从那时起，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开始接触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参加了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和集会，爱国思想日益浓厚。1936年年初，马洪经人介绍到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处（局）工作，先当录事（即文书），后考入同蒲铁路车务人员训练班（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当过售票员、行李员、运转员等。他努力自修学业，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开阔眼界。

1936年冬，马洪参加了“牺盟会”，积极参与同蒲铁路职工的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冬，太原失守，他跟随同蒲铁路局迁到侯马。11月，在侯马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由于他工作努力，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被推选为同蒲铁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在同蒲铁路沿线的各段站建立和发展工会组织，展开对敌斗争，并参与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8年，马洪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洪从延安被派往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后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因受“高饶事件”的牵连，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一和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后又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同时兼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家建委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5年，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改任名誉主任。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聘为教授及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我同王仲奇同志
谈过：在统一计划
下，中央与地方、国家与
集体、个人之间，不同
的部门和地区，不同的
企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
所有制形式，不同的
经济成份，不同的
经济关系，不同的
经济利益，不同的
经济地位，不同的
经济作用。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原则和

重大方针，是完全拥护。

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经常报告中所述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是在明确

地写入决议中。因为如果不承认这个观点，我们

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的制定，一个重要的原则

政策，都无从谈起。这个观点，不仅不能成为

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而且会成为改革的障碍。

为了使这个观点，在党内及社会上，有所说明

“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观点，是

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相结合的问题。同时，

这是与比明

这是
经济
体制
改革
的一个
重要
问题。

王仲奇同志
谈过，在
统一计划
下，国家与
集体、个人
之间，不同
的部门和地
区，不同的
企业，不同
的行业，不
同的所有制
形式，不同
的经济成份，
不同的经济
关系，不同
的经济利益，
不同的经济
地位，不同
的经济作用。

目 录

改革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	(1)
立足“四化”建设 改进社会科学研究	(13)
对河北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	(24)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33)
抓紧时机 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64)
特区建设和沿海城市开放的几个问题	(80)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	(93)
发挥广州的特色和优势	(102)
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乡镇 7000 个万元户情况调查	(105)
上海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	(111)
社会主义制度与经济体制	(124)
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135)
我国企业管理面临着全新的重大课题	(147)
关于大连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沿海城市 对外开放的几个问题	(157)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形成开放体系	(168)
新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	(170)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	(181)
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190)

走向 2000 年的中国	(195)
加强投资科学的研究, 大力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	(204)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探讨	(209)
采用创新战略 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	(220)
稳定经济, 推进改革	(225)
加强投资政策研究	(229)
在所有制改革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241)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和投资政策讨论会”的报告	(245)
关于“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座谈会”的情况报告	(252)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任务	(259)
研究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266)
关于哈尔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思考	(276)
保护古城风貌 推进现代化建设	(282)
大力发展企业之间的经济联合	(289)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	(294)
在中国投资咨询公司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303)
关于武汉市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调查报告	(306)
让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	(313)
关于二汽集团(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发展横向 联系的调查和建议	(327)
努力实现投资和项目决策的科学化	(334)
加快对企业的更新改造	(345)
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346)
搞活内外横向经济联合 加速大西南的发展	(348)
略论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和功能	(360)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378)
重新认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387)
深化企业改革, 增强企业活力	(390)
加强咨询研究工作, 促进决策科学化	(408)

改革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

我这次是来参加长白山开发讨论会的，会后准备到大连去参加大连发展战略讨论会。今天，来到这里和同志们座谈，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社会科学界是很有影响的，成果很多。《社会科学战线》这个杂志在全国、国际上都有影响，比《中国社会科学》办得早，而且办得出色。

社会科学门类很多。你们这儿每个研究所内部就有好多学科。我是搞经济的，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很少研究，可能同志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所以仅就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比如怎样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怎样改革等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一 社会科学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同志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日新月异的，70年代以来，战后开始的这场科学技术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

^{*} 本文是作者1984年8月4日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干部会上的讲话，原载《社会科学战线》（季刊）1985年第1期。

段，它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怎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世界上有不同的描述。有的把它叫做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叫做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产业革命，还有的叫做第三次浪潮，等等。不管怎么样称呼它，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现在世界上确实出现了一批新的技术群和新的产业群。这对世界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也包括我们的社会科学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来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科学的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科学相适应地发展。同时，社会科学也给自然科学以影响。世界这种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确确实实对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无论马克思、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当然，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研究这些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如果一切都是现成的，那还要我们干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科学。因为社会生产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当然社会科学同样也是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比如，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都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什么“后工业社会”。他们把社会的发展分成这么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后就是“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叫做什么社会呢？有些人把它叫做信息社会。他们认为，以前的社会都注重物质生产，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则注重信息的生产。以前的人们是靠物质生活的，后工业社会人们要靠信息生活。他们也讲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发展上许多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些科学技术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很需要的。当然，他们也解释说信息是物质化了的信息。确实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将来物质产品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会越来越节省。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节省反映了信息的发展。但是，是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不要物质只靠信息就可以生活的时代呢？

和这种观点相联系的，西方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还有另

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并不需要共产主义，也并不需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挺好。他们反过来证明这种观点：你看，我们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萧条一阵子繁荣一阵子，繁荣一阵子又萧条一阵子，每次萧条之后就预示着一次新的繁荣，资本主义就是在萧条—繁荣—萧条这样反复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这就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并不需要共产主义，将来社会也不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美国的经济学家罗斯托写了一本《经济发展的阶段》，它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在60年代我们出版他这本书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反共产党宣言》。后来，我们好多翻译家说《反共产党宣言》翻译得过分了。可是，他的《非共产党宣言》也是对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来说的。他的基本观点是：未来社会不是属于共产主义而是属于资本主义。

这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个严重的挑战。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回答。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马克思主义还是不是一门科学？我们在北京王府井街头参加过一次咨询服务，遇上了一个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对我说：“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过时了；最好的是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它代表了时代的潮流。”他不是开玩笑，而是郑重其事地提出这个问题。我向他解释了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我们的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学的就是《资本论》，却认为它过时了，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还不是对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吗！这不单单是个经济学的问题，还包括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有关的学科，甚至包括了整个社会科学。

这仅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新的产业、技术的发展确实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需要用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去解决新的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我们要对新的社会现象、经济生活现象、人们的思想状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予以科学的解答。解决这些新问题，就是创造新理论，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吸收现代科学的一切新成就、新成果。

以上是从国际上来讲的。从我们国内来讲，也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进

行科学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30 年来的经验教训，也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一条新的路线，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5 年多的历史证明了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

我们在农村实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农村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拿吉林省来讲，去年有 100 亿斤粮食储存起来，今年可能又增 100 亿斤！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我们国家大有希望。城市的变化虽然没有农村的变化那么大，但变化也不小。城市要总结农村的经验，创造适合城市的做法。农村主要是集体所有制，要把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处理好，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好，就能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城市主要是社会化生产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就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职工的关系。现在国家又决定给企业以十条权力。国营企业要创造条件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内部对职工的劳动报酬，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把企业办得好坏直接和职工的利益挂起钩来，这就有利于解决企业不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这样一个问题。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新中国成立后至少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很快就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那时，我们只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来往。苏联同我国的关系恶化之后，我们在经济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往也很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执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搞合作企业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两个月前，我到深圳开了个会。那个地方过去是个山沟的小城镇，仅仅 3 年多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城市。澳门对面的珠海过去是个渔村，现在却盖起了好多现代化的大楼。中山县是孙中山先生的老家，也是这样。从珠海到广州，沿途农村到处都看到电视机的天线。如果不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在农村、城市采取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为什么采取这些政策生产力就发展得

快，人民就得到较大的实惠？这样做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呢，还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所以，不论从国际或国内来看，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都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我们怎样迎接这场挑战，把我国的社会科学推向前进，为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服务？这就是摆在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必须联合起来解决“四化”的重大问题

社会科学门类很多。拿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说，有三十几个所，大的学科有一百多个，细分起来，小的学科有几百个。为十二大提出的总的战略目标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每个学科服务的方法应该有所不同，有的是直接服务，有的不是直接服务。但是不能说哪个学科没有服务的任务，实际上都有这个任务，只不过不能要求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有些应用学科可能直接服务多些，有些人文学科就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它至少可以为我们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方面我们大家都要研究一下，每个学科为实现党的十二大的目标、两个文明建设怎样更好地服务？发展社会科学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是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建设作贡献。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课题，也就是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些最重要的课题往往是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解决的。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离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只靠社会科学行吗？不行。反过来说，只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而离开社会科学行吗？也不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成果在社会上怎样应用，能不能应用？比如一个工程、一种技术能不能社会化，经济上是不是合算，社会上能不能应用它，这是社会科学的问题。所以，这类问题都需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比如，我们要搞长江三峡的工程，这是很大的工程，我国历史上是没有过

的。它牵涉的方面就太多啦。除了其本身的技术问题以外，要筑一个大坝应在什么地方选择坝址，怎么建设这个坝，是高坝、中坝还是低坝，怎样防止泥沙淤积？这好多问题当然是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解决的；但是，至于建大坝要移走很多老百姓，怎么样移走、安置这些老百姓，就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了。同时，它输出了电以后，怎样应用这些电，建设这个大坝怎么才是最经济的？这都是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才能解决的。

我参加长白山开发和保护的讨论会，看了开发和保护长白山的六个题目，都是自然科学家作的报告，而报告中讲的事情绝大部分是属于社会科学或与社会科学有关的。保护和开发长白山，毫无疑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都应该参加。长白山原先是满族的发祥地，是禁区。清朝初年还是开放的，到了康熙十六年才被列为禁区；以后又开放了；后来又被封锁了。为什么这样呢？这要做历史的考察。我看这和破坏与保护有一定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合作，和工程技术专家合作，特别是在经济科学方面。搞人口的研究，如不与医科的专家合作，就搞不清楚。

三 要逐步改变我们的智力结构

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尽可能地学习点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关知识。搞经济学的人如果不懂点数学就不行。现在，谈任何经济问题只有定性的概念而没有定量的分析是不行的。可是，我们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搞经济学的人有很多不懂数学，不懂统计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搞经济学的只讲了一大套原理、原则而没有任何数字说明这些问题，怎么能说是科学的呢？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系招收学生的时候，数学是按理科的要求来考试的，否则就不招收。现在西方的有些经济学家看不起我们，他们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往往对不上话。当然，对不上话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两个体系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用数学的方法解释经济问题。数学的基本概念是共同的，你

不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数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数学。西方的经济学家看得起、看不起我们是小事情；问题在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必须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不然就解决不了。现在，搞自然科学的人关心社会科学的程度要比搞社会科学的人关心自然科学的程度大。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的充分注意。钱学森同志是搞自然科学的，他现在经常讲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们搞社会科学的，过去每个人研究的只是一个学科。当然，对本学科应该精通，不然怎么能是这一学科的专家呢？但是，要把问题研究得好，仅仅靠一个学科，甚至一个学科中某个方面的知识是不行的。比如研究历史的人，只研究政治史，不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那根本不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向专业化的方面发展，同时越向专业化的方面发展越需要综合的东西，所以跨学科的新的学科就应运而生了。专门化和综合化是统一的。我们真正要把一个问题研究清楚，有一个更高的水平、更深的程度，恐怕仅靠单科去搞，成绩不会很大。这里面就有个学科本身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结合起来研究的问题。

一个学者本身的学问也应该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推而广之，我们一个研究室、一个所、一个院的智力结构也要吸收一些新的学科、一些新的人才，注入点新的血液，这样才能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四 规划、计划要从两个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过去，我们社会科学部门做计划也好，做规划也好，就只是几本书的题目。书当然要，一个学术机关不出书还叫什么学术机关？但是，只有书目还不行。计划、规划还是要以课题为主。过去，也有课题，课题就是书。而课题又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提出来，列入研究计划和规划的。这些书有的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没有联系，也有相当多的不是没有用处，而是用处不那么大。这是因为：首先，书是课题研究的结果，我们不能只在规划、计划中列出结果，而不在计划、规划中规定，为得出这一结果，必须进行哪些工作。事实上，只有把注意力放在课

题研究上，写出高质量的著作才是有保证的。其次，专著只是专题研究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我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各种课题，它们的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也会因课题的性质不同而各异。如果只承认专著这一种形式，就会使国家需要我们研究的许多课题排不上队，列不进规划和计划。加之过去有些列进计划、规划的书目是由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提出来，甚至是临时“拍脑袋”拍出来的，把这些题目汇总成为计划、规划，就更失去了指导研究工作的意义，成果的质量也完全没有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次整党时，认为这种情况要加以改变。列入计划、规划的必须是课题；选定课题又必须是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国家的课题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提出来的。

同时，也鼓励个人提出课题。但是课题必须有课题设计书，说明本课题的研究对于两个文明建设和学科发展的意义，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拟在哪些方面做出新的突破，达到新的水平，等等。没有这种课题设计书，无论课题是研究室的、研究所的还是院里的，都不能列入本单位的研究计划和规划。还有过去是否列入计划和规划，往往是以个人的名望如何来定的，某某人有名，要出什么书，不给他列入计划和规划不行。现在，进行体制改革，要实行一种新制度。在编制计划时，要由评议会或学术委员会加以审查，如果认为有研究价值，才可以列入计划。

课题确定列入计划后，如何分配任务，也应采取新方法。比如，是否可以实行类似经济单位招标那样的“出榜招贤”办法，我们可以把课题分发到各个有研究能力的单位，一个课题很可能有几个单位的几个人“投标”，都搞出课题研究设计书，按照前面所说的办法进行评定选择，然后把课题交给他，并拨给一定的科研经费。不看他的名望多高，他搞出来的不行就是不行；一个年轻人搞出来的东西有独到的见解，尽管他没有名望，也应该给予肯定。这样才能发现人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哪个人承担了课题就由他挑选人参加研究。他既可以在本单位挑选，也可以在社会上挑选。这就可以把我们当前社会科学人员不能流动“死水一潭”的问题解决了。如果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都被国家的或省的或外地其他单位的课题组挑选走了，虽然课题不在院里，这也是你们这个社会科学

院的光荣。他们完成课题任务的水平、成绩也应该记载在院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这个院承担不了课题，也可以从外单位、外地挑选人员。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谭嗣同》，就是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借调达式常扮演谭嗣同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到处叫人家借走了，说明那里人才荟萃。达式常演得好、得了奖，上影当然会给他一定评价的。

既然是课题，就要根据课题的研究成果达到的水准，承认它们的学术水平。研究报告、政策规划、方案、论文、专著，都是成果。有些可能是对党和国家的建议，又不能公开，也不用写研究报告。有的研究报告可能只写了 5000 字，而其作用可能比二三十万字的书还高，这就是看它的社会价值了。与之相联系的是牵涉到今后学术成果的考核。考核时不能只看他出了几本书、书厚不厚。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或建议可能只有几千字，但很有可能得第一名的奖金，给他的奖金应不少于写了 50 万字一本书的稿酬。评定学术职称也应采取这样的标准。

搞经济学研究的可以搞点咨询服务，开始不一定收费，以后也可能收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两种情况。比如，工业经济研究所，我原先在这个所工作过，他们四年给国家上缴了 160 万元的税，给院上缴了 45 万元，自己留了 60 万元，主要是靠电视广播讲座出书和办杂志得来的。首都钢铁公司的改革也是他们参与帮助搞的，并没有收费；重庆综合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他们也参与了，也没有收费。但也有收费的，计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给某个化工厂解决了一些问题，厂子给了几万元的报酬。我们社会科学机构不是经济单位，但是也可办些咨询服务组织，不仅经济学科，其他有些学科，如法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等等，也可以搞些咨询服务工作。当然，这要一步一步地搞。上海有个科学学研究所，16 个人，他们承担的科研项目完全是收费的。问题是切不可为了赚钱而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削弱或放弃了。我们基本的任务是搞研究工作，咨询服务也是为了把研究工作搞得更好，能更好地联系实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鼓励一些搞应用研究的所搞些咨询服务的机构。